

試論沈從文文藝觀中的「神」 ——《中國小說史》神話撰寫的意義

陳慧寧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

一) 前言

本文以沈從文（1902~1988）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神話傳說部分為基本根據，並嘗試結合文論中的論述，窺探神對其文藝觀的重要性和意義，也觀察其在轉業後所發表談藝術與文物的部分文章，【按：主要收入在《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如何表述神與文物的聯繫。而《中國小說史》是沈從文與孫俚工（1894~1962）合著。全書包括緒論、第一講是神話傳說、第二講是漢代的小說、第三講是魏晉南北朝的小說、第四講是唐代小說、第五講是宋代的小說、第六講是元代的小說、第七講是明代的小說、第八講是清代的小說。其中，緒論與第一講的神話傳說為沈從文所著，第二講至第八講為孫俚工所著。原上海暨南大學出版社 1930 年出版，現收入《沈從文全集》第 16 卷。但是，在沈從文所著的緒論與第一講的文字，理論性質薄弱，學術考證也缺嚴謹，難怪有論者認為整體上並無超人識見，自以為得意之作，實則如同兒戲。¹固勿論沈氏神話撰寫兒戲與否，這裡主要就神話背後所含蘊的「神」的意義對其創作的動力和影響作為是次探討的面向。

誠然，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有兩種特殊類型的作品。一種是根據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細節還原，如《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一種是根據佛經故事加以引申與鋪陳，以《新十日談》為副題，收入《月下小景》集裡的篇章。這兩類作品，前一類分別依據苗族與傣族的生活習俗，以沈從文熟悉化裝民間戲劇的儼驅邪儀式上，在神面前，向儼神還願後演出。²後一類的佛經故事，立意不在原有的說教，而是從陳腐的教訓與荒唐無稽的情節裡，提取某些關於人類美德的「抽象原則」。既保留了這些故事原有的「荒誕」形象，又根據自己的審美需要，加以適當的改造。³作品的人物性格除了按照理想標準加以淨化，甚至人物的形體、相貌也執意於神化的藝術處理。⁴

¹ 見黃霖〈近百年來「中國小說史」的編纂〉，收入在台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五卷·第一期，頁 77，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

² 有關儼習俗的來源和苗族的信仰，可參看金介甫著《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頁 186，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7 月。

³ 這些作品寫成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其時，都市社會人與人關係的冷漠，使沈從文感到刻骨銘心的孤獨與寂寞。那種屬於楚人的幻想情緒驅使他從一種超現實世界裡獲取慰藉，從蘊藏於少數民族原始習俗中的勇敢、誠實、熱情等品格裡，汲取生命的熱力。參看凌宇著《從邊城走向世界》頁 282，北京，三聯書店，1985 年 12 月。

⁴ 「女孩子一張小小的尖尖的白臉，似乎被月光漂過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頭黑髮，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為材料，由盤據在山洞中的女妖親手紡成的細紗。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張產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頰邊微妙圓形的小渦，如本地所說的接吻之巢窩，無一處不

因此，小說創作的「神」性以外，可以設想「神」的觀念在沈從文的文藝論述中的意義。沈從文擁有很高的美學藝術鑒賞水平，他對藝術素質的培養可追溯到他少年時期做過統領官的書記期間開始。他在《從文自傳》中提到：

「……大櫥裡約有百來軸自宋及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來了一部《四部叢書》……舊畫與古董登記時，我又得知道這一幅畫的人名時代同他當時的地位，或器物名稱同它的用處。全由於應用，我同時就學會了許多知識。又由於習染，我成天翻來翻去，把那些舊書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⁵

他對文物的興趣可說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並且這應追溯到十八歲時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做書記。這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幾十副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這些東西全由沈從文登記管理。在應用過程中，沈從文學會了許多知識。當無所事事時，就把古畫一軸軸地取出欣賞。

二) 美→愛→神

沈從文對於自己的創作生涯曾經概括在他稱之為三次「改業」的試驗用筆，即小說創作、古文物研究和五言詩的革命化。⁶畢竟，學術研究並不是沈從文的專業，而他為人所熟知的學術專業是有關新詩的發展和對當時文人發表的新詩的獨特看法。⁷

馮至（1905~1993）在〈詩的呼喚〉一文中說：「從文經歷了六七年風雲變幻的歲月，描繪了故鄉的風土人情，潛心研究並欣賞祖國的文物美術，他前半生的文學創作以及後半生的學術論著都洋溢着他的微笑，他之所以能夠如此，

見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轉側，都有一種神性存乎其間。」〈月下小景〉，《沈從文全集》第九卷，頁 219，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⁵ 〈學歷史的地方〉《沈從文全集》第 13 卷，頁 355。

⁶ 沈從文在七十年代分別寫給張兆和和蕭乾的書信提到過寫作五言詩的嘗試。在給前者的信中說：「……近乎第三次改業準備，寫的些帶試探性五言詩，如《井岡山清晨》和《紅衛星上天》，對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種紀錄，此後即不會為多數理解，卻會有一天選到什麼新詩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為一比較即可知道，不僅近五十年未有人這麼來寫新詩，以後也更不會有人這麼準備充分來寫詩了。……」而給後者的信更是明言以試探的態度去寫詩：「……因此又寫了些詩，試圖在『七言說唱文』和『三字經』之間，用五言舊體表現新認識，不問成敗得失，先用個試探態度去實踐，看能不能把文白新舊差距縮短，產生點什麼有新意思的東西。……」見《沈從文全集》第 22 卷，頁 377，381。

⁷ 沈從文於 1930 年上半年在中國公學曾講授以新詩發展為內容的『新文學』課程，其後任暑期課程時又教新詩。7 月中旬在致王際真信中寫道：「這次一定把講義好好編過寄來給你。」9 月，應聘到武漢大學任教，11 月又在信中告訴王際真，為他寄了「一點論文講義，那個講義若是你用他教書倒很好，因為關於論中國新詩的，我做得比他們公平一點。」《新文學研究》講義，原由武漢大學印行，據《沈從文全集》編者記載，前半部是編選以供學子參考閱讀的新詩分類引例，後半部是沈從文六篇談新詩的論文。這六篇詩論文章，於講義印後兩年間，分別在報刊發表，1934 年其中三篇收入沈從文的文論專集《沫沫集》出版。

是由於他永遠保持童心，他的『赤子之心』願人世充滿崇高理想。」⁸

『美』和『愛』是沈從文從事寫作的動力。如果說他的文學創作描寫愛來表現美的話，他的文學評論則是發現美，創造美來表達愛——愛文學、愛人生、愛一切善良而美好的天性，而這美好的天性無不充斥著以『赤子之心』爲人處事的態度。沈從文說：「我們生活若還有所謂美處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應用到正確方向上去，不逃避人類一切向上的責任。組織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處同可讚賞處，全在它魄力的驚人。」⁹他稱『美和愛』，爲『神』或『宗教』，並認爲生命永生和文學藝術都源於人類的『愛』，「一個人過於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爲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生命之最高意義，即『神在生命中』的認識。他把神和宗教分開，認爲「惟宗教與金錢，或歸納，或消蝕，已令多數人生活下來逐漸都變成庸俗呆笨，了無趣味。」而「神的解體」卻帶來「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學，多蜻蜓點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閹割的人生觀，多閹宦情緒，多無根傳說。」¹⁰

在他視一切文學藝術爲美和愛，生命最高意義實現爲神時，他其實是將對湘西的敘說志業，將依違於神話與歷史之間所煥發幽邃的湘西視景，一方幻化爲萬千讀者心嚮往之的文學「故鄉」，一方以平淡謹約的文字掩蓋他浪漫激進的寫作姿態。¹¹

沈從文追求這種『神在生命中』高度體現在文學藝術，「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¹²所以，他對文學有的信仰，需要的是這點屬於宗教神聖性和莊嚴性的宗教情緒。他在告誡讀者的信中，談及「寫作一支筆常常不免把作者帶入宗教信徒和思想家領域去，每到擱筆時衰弱的心中必常常若有一種悲憫情緒流注，正如一個宗教信徒或一個思想家臨死前所感到的沉靜嚴肅。並且明白了幸而是寫小說，無節制的大規浪費，才能把儲蓄積壓的觀念經驗慢慢耗盡，生命取得平衡。」他的創作就是爲了不斷尋找通向『美和愛』的新宗教精神。¹³

沈從文在〈《斷虹》引言〉中提到要以這個故事的處理方式，企圖將人事間的鄙陋猥瑣與背景中的莊嚴華麗相結合，而達到一種藝術上的純粹。他深切感受到自然景物的敏慧和細膩設計，是邊民宗教熱忱的由來。相信由皈依自然而重自然，即是邊民宗教信仰的本旨，因此，他寄予這個故事給人的印象，不能

⁸ 收入在馮至著，柯靈、范泉主編《文壇邊緣隨筆》頁 11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年 8 月。

⁹ 〈《小說月刊》卷頭語〉第 1 卷第 3 期，《沈從文全集》第 16 卷，頁 422。

¹⁰ 〈美與愛〉《沈從文全集》第 17 卷，頁 360、361。

¹¹ 王德威以沈從文這種現代原鄉敘述是最重要和最應引起的貢獻，認爲他企圖要在湘西不毛之地上，編織出歷史的網絡。從兩千年前屈原孤憤悲歌的路線，東漢馬援南征的遺址、沅水中游的伏波宮來由、廬子岩的崖葬木棺之謎、白河岸邊的立約銅柱、鳳凰縣山間的古堡等，無不訴說著湘西與外界接觸來往的血淚點滴。〈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收入在《想像中國的方法》，頁 22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¹² 〈抽象的抒情〉《沈從文全集》第 16 卷，頁 527。

¹³ 〈談文學的生命投資〉《沈從文全集》第 17 卷，頁 459。

避免的要接近一種風景畫集成，而人在這個背景凸出，但終無從與自然分離。¹⁴一切都以人事來作說明，來寫二十世紀新的經典，自然而然超越了普通人習慣中的心與眼，有助於認識一切現象，解釋一切現象。由於我們的無知，一切奇蹟都出於神，新的奇蹟出於人，國家重建社會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¹⁵沈從文是堅持這樣的信念的。

三) 沈從文《九歌》文藝觀的神、巫

在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中，似乎對於神話、神性或與巫、鬼的敘述有特殊的見解。其於 1928 年的短篇小說《山鬼》¹⁶為例，故事講述一個癲子是個乾淨、平和的精神病者，他還特別富有山歌、傀儡戲和手工藝方面的天賦。沈從文在山鬼故事中不遺餘力地強調癡狂與清醒之間的微妙關係。顯然沈從文對筆下的精神病症有一種神秘的沉醉之情，這可能源於他對楚文化的向往。¹⁷敘述者通過他弟弟和母親驚異的眼神來看癡子，平靜地寫出他們的憂慮。沈從文後來沒有深刻的鑽研巫文化，不過卻在創作小說的時候，融入他對神話的嚮往和宗教的觀念，顯示湘西自然生命的精神本質。夏志清教授以為誠然沈從文沒有提出任何超自然的新秩序，他只肯定了神話的想像力的重要性，並且認為是使我們在現代社會中，唯一能夠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¹⁸

沈從文在寫《中國小說史》的時候，曾認為屈原寫山鬼、寫湘夫人，具有小說或戲劇的風格，比莊、列二子在描寫上更能深入，使後人從他的作品上得到「神的人性」的解釋。山鬼、湘君、湘夫人之間或伫山之阿，或倚水之唇，是山水間的靈氣和精魂，被屈原描繪成山神、水神、河神，因此她們都有著一種冶艷、清麗、憂鬱之美。沈從文欣賞的是屈原寫的神話有這種「神的人性」。筆者以為在沈從文敘寫《中國小說史》前後，也培養了他對巫文化的興趣。在 1931 年，沈從文曾寫了一封信給王際真¹⁹，信中有這樣一句話：「近日來在研究一種無用東西，就是中國在儒、道二教之前，支配我們中國的觀念與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發展，從有史以至於今，關於他的源流、變化，回到在一切情形下的儀式，作一種系統的研究。」²⁰正如沈從文在《湘西》中描述的那樣，他所浸潤的楚文化是一個充滿想像的天地，各種鬼怪精靈充斥其間，與人類共存。

沈從文在《〈鳳子〉題記》中指出想用這部鄉土抒情詩的作品，「來替他所

¹⁴ 《沈從文全集》第 16 卷，頁 340。

¹⁵ 〈學習寫作〉《沈從文全集》第 17 卷，頁 332。

¹⁶ 屈原《九歌》的第九章題為《山鬼》。但「山鬼」是一個居住在山間的女鬼。

¹⁷ 楚文化饒富各種歌賦舞樂、儀式傳說，是富有多樣詩意想像和宗教儀式的世界。當沈從文搜尋小說素材時，得自然的，那些山嶺岩洞的幽暗意象、鬼魅似的人物和難以索解的文化禮俗便悄然襲上他的心頭。參看王德威著〈批判的抒情〉《現代中國小說十講》頁 15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年。

¹⁸ 參看夏志清著，劉紹銘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161，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 年。

¹⁹ 王際真，翻譯家，是經徐志摩介紹相熟的文學朋友，當時剛赴美國。

²⁰ 〈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第 18 卷，頁 151。

見的這個民族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會組織，試作一種善意的紀錄。」²¹這部中篇小說的前九章完成於 1932 年，第十章〈神之再現——鳳子之十〉寫於 1937 年，從主人公看完湘西社會的迎神儀式後的一番言詞，可了解沈從文凝思五年，如何從《九歌》取得靈感和邊地民俗相結合，探索原始宗教神性的淵源。

「……在哲學觀念上，我認為神之一字在人生方面雖有它的意義，但它已成歷史的，已給都市文明弄下流，不必需存在，不能夠存在了。在都市裡它竟可說是虛偽的象徵，保護人類的愚昧，遮飾人類的殘忍，更從而增加人類的丑惡。但看看剛才的儀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過它的莊嚴和美麗，是需要某種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神仰賴這種條件方能產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麗。缺少了這些條件，神就滅亡。我剛才看到的並不是什麼敬神謝神，完全是一出好戲；一出不可形容不可描繪的好戲。是詩和戲劇音樂的源泉，它的本身。聲音顏色光影的交錯，織就一片雲錦，神就存在於全體。在那光景中我儼然見到了你們那個神。我心想，這是一種如何奇蹟！我現在才明白你口中不離神的理由。你有理由。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二千前中國會產生一個屈原，寫出那麼一些美麗神奇的詩歌，原來他不過是一個來到這地方的風景紀錄人罷了。屈原雖死了兩千年，《九歌》的本事還依然如故。若有人好事，我相信還可從這口古井中，汲取新鮮透明的泉水！」²²

《九歌》的原始形態是以民間口頭文學的形式依憑於沅湘之間的宗教巫風的，沈從文認為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從那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來的。本來的神曲，卻依舊還保留在這地區老歌師和年輕女歌手的口頭傳述中。²³當中在娛神歌舞戲劇中展示神神相戀或人神相戀的淒麗故事，是楚國原始巫術之遺風，為屈原創作準備了一份豐厚的感情資源。王逸《楚辭章句》：「楚國南部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而整個屈騷，正是人與神感情的提升。沈從文的〈神巫之愛〉就是從沅湘邊地的三苗巫文化的遺風中汲取古井泉水的。而他基本認為屈原對神話的貢獻是他把神話美化與人化。

四)《中國小說史》神話與史家、方士、諸子的論述

所謂歷史與神話的區別並不在形式，而在內容和目的。沈從文認為神話的內容，乃「初民糅雜了事實同迷信兩種成分而成立的傳說」，而歷史，是「中國的上古史。其實中國上古史同神話並沒有是兩樣東西。就是到中古，也仍然只可以

²¹ 《沈從文全集》第 7 卷，頁 79。

²² 〈鳳子〉《沈從文全集》第 7 卷，頁 163。

²³ 見〈湘西苗族的藝術〉，收入《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頁 182，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 年。

說是一種神話的複述，或沿神話而創作的史錄。」到後來由簡單文字記下，目的為經史家修飾成為新史的一頁。例如司馬遷於《史記》中記載黃帝的事蹟，企圖以年代湮遠，論者不一，只選比較記述典雅的一些由史寫成篇章，而以「不離古文」的說法，就是正合於儒家從神話中把三皇五帝創作成為理想中的君王標準的宗旨。至於有史以後又因什麼還有神話傳述？第一是雖有了皇帝，以及為皇帝作史的史官，一般人還是對於天空、人事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第二是為人類的好奇。²⁴畢竟，人們仍然對自然有種神秘的疑惑，仍然必須要依靠自然的因素解釋人事，而這無疑牽涉到與神話關係頗為密切的卜筮之說。方術之士的存在對神話流傳的影響深遠，沈從文甚至認為「卜筮為成於人類最愚昧的時代，人對於神有一種信仰，對於天地日月星辰風雨有一種傾倒的時代，先君王存在為人類首領的即是懂卜筮的人。」²⁵

其時，胡適（1891~1962）於1930年發表的《中古思想史長編》裡曾提到過記漢武帝的宗教，不可不連帶敘述「巫蠱」的大案子，因為那件案子最可以描寫這個帝國宗教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上發生怎樣重大的影響。²⁶皇室敬天祭祀，皇帝祈求長生不死，必求神問卜以達心安理得，而無可否認的是從事此行業者的重要性。沈從文在轉業以後專治文物的文章裡，也坦承表示其存在：

「最早式樣的形成，或在漢武帝時，反映於一個小小青銅戈戟附件上，用金銀錯法表現仙人駕芝蓋白鹿車於雲中奔馳，正與漢樂府詩：「仙人駕白鹿」相合。這個美術品，目下雖陳列於故宮博物院戰國藝術館櫃子中，事實上，它是在河北懷安西漢五鹿充墓中出土物，很可能還是武帝東封泰山求長生不死，或文成五利在長安齋宮壽宮作法事，武帝隨從執戟郎官手中物。」²⁷

小說性質寓言記異，性質與神話不同，但經史家所採用的，已逐漸遠離了神仙傳奇，與詩一樣向「史」靠攏，沈從文認為「文字發達固然使神話毀滅，但文字進步也是使小說脫離了神話述異，另外新辟一寫實的道路機會，小說因得了這種機會，才擺脫了傳說而獨立。」²⁸沈從文指出小說內容沒有神話的成分，加上文字的普遍化，使小說擺脫神話的束縛，以寫實姿態出現，邁向發達。以漢人小說中「如題為東方朔撰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等等，如題為班固撰的《漢武故事》、《漢武內傳》等等，我們既有一種疑惑是出於後人的依托，不甚相信，可是從《漢書》的「列傳」去找尋，很有些人物是完全當寫實小說而寫成的。雖然傳記的起始還應當上溯到《史記》，再上溯到《國語》與諸子，反於「史」字的「信」，其來源正不後於神話故事成立多久。下而至於《西京雜記》，至《世說

²⁴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10、11。

²⁵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50。

²⁶ 參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三)》頁900，台灣，台北市，聯經出版，民國七十三年。

²⁷ 〈試釋『長檐車、高齒屐、斑絲隱囊、棋子方褥』〉，收入《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頁70。

²⁸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17。

新語》，神則已完全獨立，小說也獨立一隅不再倚賴神話了。至於唐以後的鬼神小說，其所據當然已為漢時文人、方士、皇帝所構成的鬼神，不再是《山海經》的古傳說了。²⁹

沈從文在《中國小說史》中認為諸子中的貢獻最有功績的是列子同莊子，史中最有功績的是左丘明，文學家是屈原以及屬於屈原一類的宋玉一流。列子是一個創作家，莊子是一個借用神話而用創作形式表現他思想的作家，屈原之徒是因為政治得失成了病態的傾心於神話的瘋子。他們都用文字自由抒寫打破了文字為史家專利的習氣，而又與神話傳說有密切關係的。在詩中，人的戀愛情緒只是對於人的，由屈原起才生明白的大膽的有對於神的獨戀的煎迫哀訴。屈原的表現技術雖多屬於詩的形式，但他那病態的憂鬱，以至於想從神的援手達到自我滿足的意識，是一個可同情的創作意識。他們所說的神靈才是原始的神靈，因為缺少方士的一切氣息。³⁰

沈從文認為神話傳說多產的原因，是因為方士承傳自然神話的作用兼且加諸的各種變化³¹：

「在漢時若文人不弄筆墨，儒家的思想又能徹底排斥一切，恐怕中國傳說到今日就剩有盤古、三皇、五帝那一點點也是不可的。若能使一個民族真全無迷信，完全以孔教為依歸，自然也不是一件極壞的事。不過到了漢武帝，忽然對於神仙發生了興味。神仙的產生，雖然是神話傳說稍多，以後方士輩托道教老莊為護符，而以達到傳說的地方，而宣傳的一種騙術。最先受這騙的是秦始皇，再次就輪到了漢武。方士把神話又加以變化，古傳說西王母這個人物漸成為文士向慕君主單戀的一種東西，於是傳說的變化以後還保留的就只是西王母，其他完全失去了。鬼在周厲王只一見的，在秦時就漸多，至於漢，更多了。鬼為神話傳說一支脈，六朝、唐、宋以後的小說，是有三分二以上用鬼這一個概念作根據而寫成的。」³²

《山海經》之類方志富於史傳的紀實性與文化的象徵性，但出之方士之手，難免有功利目的，其性質流於邪魔，畢竟間接表現原始巫術文化的自然神話本色。屈原和《楚辭》，它的神話體系和文化精神的本質不屬神話，是詩人給予審美與道德含意的永恆載體。

同時，於記載神仙方士最的材料，當推《史記》中的封禪書³³，而漢代部分工藝圖案花紋，確實多和當時神話傳統有一定聯繫，而與神的牽引不能脫離關係。沈從文指出：「《史記·封禪書》等記載東海上有三神山，上有白色鳥獸和仙

²⁹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17~18。

³⁰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18。

³¹ 沈從文認為神話傳說的保留、損失與變化，除了儒家思想，其他還有文字發達、仙人得勢和佛教的傳入。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14。

³² 同上書。

³³ 聞一多在〈論《楚辭》〉的文章中另外還提到《始皇本紀》和《漢書·武帝本紀》也有記載神仙方士的材料。他還說：「試加分析，考其中有名的方士，韓、趙、魏各一人，燕六人，齊二人，以燕國方士為最多，這是始皇以前的情況，至漢武帝時，方士就全是齊人了。」參看鄭臨川記錄，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誦傳薪錄——聞一多、羅庸論中國古典文學》，頁48，2002年12月。

人一道游息同處，長生不死，通過藝術家想像，因此不僅反映在當時銅、陶制博山香爐和酒樽等器物上作為裝飾，同時還廣泛使用到一般石、漆、銅、木的雕刻裝飾紋樣上，絲綉也多採用這個主題，作成各種不同發展。……」無疑，當時藝術家的想像豐富，通過神話色彩而創制高水準的藝術品。

神話在諸子手中成為各種不同意義上「自我調劑」的東西，這與史家對於神話的態度基本相同。沈從文以為神話本來是「與史相衝突與人類實際知識也相衝突的一種東西，它之成為佐史輔論的材料，應歸功於諸子之前或同時各類「斗方名士」的紀錄與保存。「方技術數，與史無關的，書即出於魏晉，在文字上仿佛很有許多最古傳說，在許多書上還可找出一些證據。古醫書同古兵法，其中才正有不少最原始的傳說在。以人與神相貫通，人間較有名望的人與出奇的大事與星辰日月天道有關，這話是先在方技者流口中說來說去成為一種真理，以後史家才會記述的。」³⁴諸子創作神話來源於方術技士，方術者流稱「雜家」，《隋書·經籍志》釋雜家為「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³⁵

沈從文在多年以後發表的〈古代鏡子的藝術〉一文中³⁶，集中談到方士對工藝品的影響和漢代文物神巫的考證，貫通所謂巫的說法：

「……正如漢代一般工藝圖案相似，在發展中起始見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東王公車馬神像鏡，銅質精美，西王母蓬發戴勝，儀態端莊，旁有玉女侍立，間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豎蜻蜓表演雜技。……這種鏡子浙江紹興一帶出現最多，為研究漢代西王母傳說流行時代和越巫關係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³⁷

方士源於巫術文化傳統，承傳自然神話的精神，展示自然神話的作用。諸子和史家發揮神話體系，藉以啓迪道德社會，利用神話精神奠基文化和歷史。

五、結論

汪曾祺（1920~1997）在〈沈從文轉業之謎〉文章中曾提及沈從文在文物研究上是「能把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完美地結合起來，搞出了成績」的一個文物學家。他認為沈氏「愛國愛民，始終如一，只是改變了一下工作方式」。³⁸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表現方法，乃至造句修辭，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³⁹從小說創作到古文物考察一路走來，這無疑是對沈從文事業最公正的看法。

確實，不僅只是小說，就算是治文物，都有沈從文一貫的主張，「凡是有健康生命所在處，和求個體及群體生存一樣，都必然有偉大文學藝術產生存在，反

³⁴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50。

³⁵ 見〈中國小說史〉，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6卷，頁51。

³⁶ 原載1958年發表的《唐宋銅鏡》一書題記。

³⁷ 收入《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頁44。

³⁸ 收入《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頁3。

³⁹ 見〈與友人談沈從文〉，收入《晚翠文談新編》，頁164，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映生命的發展、變化、矛盾，以及無可奈何的毀滅。」⁴⁰因此，對於神話的傳奇性，沈從文寄予一種特別關注的視角，或者除了神話裡具有他所說的健康生命的存在外，也使他對於歷史的考究加上一層淡淡的神秘色彩。確切的說，中國社會和文化有一份屬於自己的更為隱蔽的歷史，這就是文學領域中自然情感文化的起伏跌宕，實際上這營造了一股屬於沈從文自己獨異的看待神話與歷史、小說的眼光。「神話是幫助我們發現內在自我的線索」⁴¹，也加深了沈從文在《中國小說史》中對歷代典籍裡的神話傳說的認識。

⁴⁰ 〈抽象的抒情〉，收入《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頁 21。

⁴¹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bell)、莫比爾(Bill Ma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The Power of Myth)，頁 7，台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6 年。